

大学周刊

■2011年4月12日

■周二出版

■第510期

■编辑部电话：010-82614599

■电子信箱：dszkzhxx@163.com

daxue@stimes.cn

大学校长访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程琳：借势公安一级学科设立 建设国际一流警察大学

□本报记者 孙琛辉

3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将公安学、公安技术列为国家一级学科,分别列入法学、工学门类。至此结束了公安高等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公安学科的历史。

“公安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公安院校的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可以说,有了公安一级学科作支撑,公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就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就有了自己的施展空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程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该校作为我国公安系统建校时间最长、学科专业最齐全、办学规模最大、教育层次最完备的高等学府,将以此为契机,不断开创教学科研新局面,全力创建国际一流警察大学。

培养具有公安大学特色的学生

《科学时报》:作为全国公安机关的最高学府,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安大学为我国公安政法机关培养、输送了20余万名领导干部、业务骨干和专门人才,被誉为“共和国警官的摇篮”。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前,学校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程琳: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在全部公安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公安机关承担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周永康同志强调:“具有过硬素质是公安队伍完成历史使命、依法履行职责的重要前提,加强教育训练是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的根本途径。”公安大学作为公安机关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始终把为建设强有力的公安工作 and 强大的公安队伍, 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合格人才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我认为,公安大学高度重视公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对学校给予殷切期望。孟建柱部长希望公安大学建设成为科教强警的生力军、教育训练的主阵地、提高民警素质的大学校、对外警务交流的新窗口,朝着建设国际一流警察大学的奋斗目标迈进。

党和人民的期待,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要求,决定了我们的使命,决定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科学时报》:与教育部直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相比,公安大学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有哪些特点与特色?

程琳:公安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既是一所承担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又是一所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公安高等学府;它的教师既是人民教师,又是人民警察;它的学生既是通过高考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又是共和国预备警官。

我认为,公安大学的特色和优势应最终体现在学校培养的学生身上。经过对公安大学毕业生情况的综合分析和基于公安队伍对学生素质的要求,我认为公安大学学生应该具备以下七个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第一是忠诚可靠。这是公安大学性、任务和培养目标所决定的。公安大学培养的是人民警察,政治坚定、忠诚可靠,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是人民警察的政治本色。公安大学校训第一句话就是忠诚,忠诚教育是学校的传统,也是学校的优势。

第二是业务扎实。学生应该掌握和具备扎实的公安业务、法律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

第三是敢于创新。创新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之源。要让学生具有发展后劲,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第四是精于实战。作为公安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公安工作,这就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实战能力。

第五是一专多能。公安工作任务决定了公安民警要有丰富的知识,能够胜任多个岗位工作,具有较高能力和水平。

第六是作风优良。从多年我校毕业生分配就业实践实践来看,作风优良是一大优势。

第七是身心健康。公安民警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面对着各种复杂的情况,经常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这就要求公安民警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这两方面的训练。

设立公安一级学科 具有重大意义

《科学时报》: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将公安大学主导论证的公安学、公安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分别列入法学、工学门类,同时批准学校设立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此,向您表示祝贺。请您谈一谈公安学一级学科设立的意义。

程琳:此前,公安高等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公安学科,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公安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

公安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公安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重大突破和质的飞跃,其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对公安工作实践的重大意义。《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将公共安全列为11个“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有了公安学科的支撑,公安领域就能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方法创新,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期一系列深层次公共安全问题。

二是对公安队伍建设的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公安民警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从学历层次看,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仅0.03%,有硕士学位的仅1.03%,有本科学历与学位的仅40%,与国内外政法部门相比,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工作明显滞后;而拥有专科学历的公安民警,所学专业大多并非公安类,难以适应艰巨复杂且专业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公安工作的需要。加强公安学科建设,可显著强化公安高级专门人才培养。

三是对公安高等教育的重大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没有设置独立的公安学科,导致相关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学科不能对接,影响了公安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甚至还影响到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和毕业就业。比如,本科教育中具有广阔前景的侦查学、治安学、刑事科学技术、消防工程等学科专业,在研究生教育中却只能分别依托诉讼法学、行政管理、材料科学、安全技术及工程等专业。又如,研究生所学侦查学、治安学、交通管理与控制、计算机物证等方向均不被承认为公安学科,毕业生不能报考公安机关职位,造成公安教育资源浪费并带来一定不稳定因素。设立独立的公安学科后,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是对公安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学科建设是科学研究的推动力,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拉动力。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置了相关的公安(警察)学科,并设立了专门的或相关的警察学校,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我国近几年来公安领域的科学研究蓬勃发展。公安一级学科的设立,有助于通过学科建设整合我国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科技资源,建立并承担系统性、前瞻性、综合性研究项目。

五是对公安院校发展的重大意义。学科是承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平台,是高等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公安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公安院校的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这分别体现在办学体制改革奠定学科基础,为办学目标定位提供依据,

程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行政一级警监。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安防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全国警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中国警察协会警察法学研究会会长。曾任公安部政治部现设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和防病毒研究中心主任。



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造条件,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保证,为学校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等五个方面。

《科学时报》:那么,公安大学将如何借助这一有利契机推动自身发展?

程琳:公安大学自开办高等教育之始,就十分重视学科建设,至今已有30多年。但是,自己主导,以我为主,建设本领域的公安一级学科,这还是第一次。如何“下好先手棋、掌握主动权”,推动公安高等教育新发展,开创学校教学科研新局面,确实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结合公安大学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公安一级学科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个人认为,公安大学学科建设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学规划学科发展战略。要站在学科的前沿,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把公安学和公安技术学科建设成为国内或国际一流学科,是公安大学学科建设的长远目标和最终目标。但对于一个新学科,如何在3~5年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和发展则至关重要。学校“十二五”将努力实现以下目标:科学规划两个公安一级学科的学科体系,调整优化公安学科专业,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基础;全力将两个一级学科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纳入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进行建设,争取在公安二级学科中建设5个左右省部级重点学科,努力争取在两个一级学科或所属二级学科中取得2~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争取在每个或大部分二级学科建立硕士学位授权点。

二是着力加强科学研究,促进学科建设。要积极参与科研项目、立大项,拉动学科建设上水平;要大力倡导科研创新,推动学科交叉融合;要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以科研“养”学科,以学科促科研;要完善学术交流研讨机制,激发科研工作 and 学科研究的活力。

三是大力加强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队伍建设。通过实施“名师工程”,加强学术团队建设,强化中青年教师培养,发挥教研室功能等措施,倡导教师用高质量的科研促进教学工作,把最新科研成果融入学科建设和发展,占领人才培养高地。

“五个结合”瞄准国际一流警察大学奋斗目标

《科学时报》:您出任公安大学校长后,提出“高教与培训相结合、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研与智库相结合”的办学思路。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如何落实到学校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去?

程琳:“五个结合”的办学思路,是根据公安部党委对我校的战略定位和学校60多年的办学经

验,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的。具体考虑和安排如下:

第一,高教与培训相结合。高等学历教育是学校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创建国际一流大学的基础。同时,我校是从开展公安干部培训而建设发展起来的,这是传统优势。在新的历史阶段,公安部党委作出了构建“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的战略部署。我校作为公安部直属高等院校,同时也是“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要在遵循高等教育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公安工作特点,继续办好公安高等学历教育,为公安机关培养和输送具有公安大学特色的优秀人才;还要下大力气抓好培训工作,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办好公安部党委、政治部、有关业务局交办的以及各地公安机关委托的培训任务。

第二,教书与育人相结合。这是对学校管理、教学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广大教职工的基本职责。在教书问题上,一定要把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好。全校教职工还要以自己扎实的专业素养、良好的品德和作风去教育、感染学生,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不仅学会做事,首先是学会做人。

第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校要办出特色,发挥公安系统最高学府示范作用,就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科研工作的第一目标,做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教法创新和管理创新。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

第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公安大学培养的毕业生,第一任职的需要就是能在基层公安机关从事公安业务工作。我们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制定新的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以职业精神、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教育培养为核心,全面实施“教、学、练、战”一体化、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五,调研与智库相结合。我校作为公安部直属院校,学科专业涉及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应为公安部党委决策承担专题调研任务,有效发挥智库作用。

《科学时报》:您强调,公安大学的科研工作要把自主创新作为第一目标。请问学校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强科研工作,实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教法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目标?

程琳:公安高等院校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实施科技强警战略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基地。近年来,我校科研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公安科研机构 and 地方高水平院校的科研工作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科研工作。

一是要紧紧围绕公安中心工作和教学培训的需求,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要瞄准公安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并围绕学校教学培训业务相关的学科领域开展科学研

可怕的“4000万标准”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4月4日发布的这样一条微博,特别是其“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论,招致不少异议和否定。

“4000万标准”受质疑后,董藩解释这实际是个励志的说法,而且只针对他自己专业的学生(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专业),因为他的学生今后很多都是要搞实业的,必须要培养他们的“财富意识”。

大学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除传授学术理论、知识和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世界观、人生观的熏陶。不少世界名校都很注重对学生人生哲学的培养。如哈佛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真诚、正直、忠诚、责任感的品质,耶鲁大学注重培养学生为社区奉

献的精神等等。

与此相比,将自己“身价”不够丰厚的学生扫入“失败”的垃圾筐,甚至在他身上贴上“耻辱”的标签,取消他上门看望和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资格,这样的老师何其决绝!当掌握知识并肩负教育重任的大学教师都摒弃基本的道德传承任务,大学将教给学生什么?

简单算算,一个研究生从二十多岁毕业,要在短短十几年里积累价值4000万元的个人资产,平均每年收入需300万元左右。即使按董藩的解释,“搞实业”确实来钱快,他的学生也只是“很多”而非“全部”投身实业;何况他教的两个专业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房地产业,“土地资源管理”还好说一些,“政府经济管理”的学生真找了名副其实的工作该怎么办?

通过合法手段拥有大量财富,固然是成功的一种标志;但若将财富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甚至将财富和道德画上等号,将是最大的失败! (孙琛辉)

中国大学评论

院系所的名称需要规范

□刘海峰

中国高等教育在不少方面往往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而且由来已久,从招生、学校更名、校史追溯,到院系所的设置和名称都是这样。

清末民国时期,高校自主性很强,于是招生乱象丛生,野鸡大学或虚名甚多,政府不得不进行整治,专业设置亦如此,现在有所谓“部控专业”,教育部对发展的过多过剩的专业设置实行限制。而清末民初,政法专业畸形发展,1909年,在全国各省104所专门学堂中,仅法政学堂就有46所,占总数的44%,学生数达11688人,占专门学堂学生总数18639人的63%。到1912年,法政专门学校有64所,占全国专门学校总数122所的52%,法政科学生30808人,占有学生总数41709人的74%。后来经过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力控制调整,专业结构才逐渐趋于合理。

目前学校更名要主管部门批准,高校没有自己更名的自由。而如果任由学校自主决定校名,估计总有好多大喜功、心比天高的校长会想出“世界大学”、“全球大学”或“宇宙大学”这样响亮的校名。校史追溯应该完全是学校自主的事吧?于是有些大学纷纷将校史上延,甚至将不是自己前身学校的清末学堂也认作祖宗,忽然而间将校史拉长了几十年。

当今中国还有一个体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典型事例,便是高校院系所的设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高校的院系都需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才能建立。当时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高校很少有办学自主权,存在着统得过死的弊端。后来政策逐渐宽松,并发展到院系所的设置完全由高校自主决定。开始还好,大部分高校都能根据学科性质和规模来设置系、所。到新世纪初,全国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升格风,多数大学的系、所都在几年内改设成了院系的名称。

我所服务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是国内最早成立的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1978年5月成立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改设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还由教育部直接下达20名研究人员编制。经过20年的发展,到2004年4月改为研究院。在国内早期成立的同类研究机构中,我们是最迟改称学院或研究院的。改为学院的原因主要还不是随大流,而是因为学科发展后的内在需要。原先只有高等教育学一个学科招生,到2003年,除了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以外,还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较教育学等其他5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在招生,又没有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原有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名称已无法涵盖其他学科,且2004年专职教师已有近30名,于是才有改名之举。

许多大学经过多年的办学,因规模扩大、学科扩展,将原有系、所逐步发展成为院,不足为奇。大学决定便可以成立院系所,体现高校办学自主权。但存在的问题是,有许多高校的院系所的设置太随意,其典型表现,一是部分院系所有名无实,二是学院之下又设学院。

现在有的高校中,有1个研究人员就称所的,仅三五个教师就改称学院或研究院的。应该有几个专职教师才能称为院、系、所?目前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可以说基本上处于没有章法的状态。我们大陆的民众曾经笃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具体而可量化的衡量标准,有名无实的院系所只会越来越多。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必须有7名以上专职教师才能设立研究所,7~9名以上教师才能设立学士学,除法学院以外,通常要有3个以上的系才能设立学院。在台湾高等教育评鉴制度设计中,主要进行的是系所评鉴,也就是学科评鉴,这样的评估更具有可比性,并可以控制徒有虚名的院所泛滥。

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学院之下又设学院。当今有越来越多的本科院校,学院底下再设学院。当看到其他同类学院之下都设了十来个学院时,一些学院的领导往往也按捺不住升格的冲动。甚至连大学办的民办独立学院之下,也设十来个学院,于是出现“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经济学院”这样的名称,搞得局外人摸不着头脑,此院长与彼院长到底是不是同一码事。为了区分,于是学校一级的院长就得称校长,校内不宜称院长,以免混淆视听。这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对“某某学院经济学院”这样的单位名称,怎么看都得不顺。既然学院之下可以再设学院,那么大学之下是否可以再设大学呢?如果“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哈佛大学教育大学”的名称,你看了不觉觉得别扭吗?

当境外学者问起大陆为什么学院底下又设学院这个问题时,我实在不好回答,只是为我们大陆的院系设置现状感到不好意思。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牌子够大了吧?但它们下设的机构都是研究所,即使是好几十人的研究所也不会改称为研究院,因为大家都知道研究院之下不宜再称研究院,否则会造成概念混乱。我觉得,学院之下还是称系为好。等学院更名为大学以后,再将系升格为学院更妥当一些。

就像道路交通需要制定规则否则就会混乱一样,院系所的设置也应该名副其实,由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基本的规范性文件,否则目前的乱象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而且可能愈演愈烈。

规范院系所的设置并不是要回到“一管就死”的状态,而是希望走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未来。果如此,才可能达至院系设置“海晏河清”的境界。

主 编 崔雪芹
本版责编 孙琛辉